

于斌·貝祖貽·林頂立

黃天邁

浪跡天涯憶舊遊之四

(本文插圖刊第5頁)

于斌一代哲人

于斌(野聲)樞機主教於一九七八年奔教宗保祿六世之喪在羅馬逝世，瞬屆八週年。回憶我半生與于樞機交往情形宛如昨日。于樞機的道德文章及輝煌成就，國內外報刊已有詳盡報導，無需贅述。茲就記憶所及，追敘往事片段，以資紀念。

一九三九年，正值我國抗戰最艱苦階段，于樞機受蔣委員長介公及夫人重託，以南京區主教身份訪問美國、加拿大及歐洲幾個主要國家：英、法、義、荷、瑞士等，推動國民外交，爭取國際同情與支援。于樞機到巴黎時，顧少川大使爲他舉行歡迎酒會，邀請法國政要、各國外交使節、天主教神職人員及新聞記者等二百餘人，極一時之盛。我在酒會中與于樞機第一次會晤，那時他不過三十八歲，魁梧奇偉，氣宇軒昂。他操流利英、法、義等語文，周旋於衆賓客之間，朗爽親切，如發出一股暖流，使人樂與接近、爭與攀談，氣氛極爲融洽，翌日法報譽爲傑出「宗教大使」。我是半個主人(時任駐巴黎總領事)，忙

於招待介紹，未能與于樞機長談，但彼此留下深刻印象。日後蒙他多方照顧，爲我闡釋教義，得在中年皈依天主，實導源於巴黎一日之雅，可謂有緣。

一九四三年，我在重慶，在一次吳鐵城先生宴會席上與于樞機重逢。他向我招呼，親切如老友。我問我是否仍在外交界任職，我告訴他我已由軍委會借調，現在軍統局工作。他說：「蔣委員長領導抗戰，一身繫天下安危。戴笠(雨農)先生是委員長最得力的中堅幹部，靖亂除奸，身負重任，甘做無名英雄，令人佩服。你能幫他，那太好了。有機會我很想去看望他，好好談談。」我說我可以安排一個約會。當晚我即向戴雨農(笠)先生報告，戴先生命我約好時間請于樞機吃便飯。時間訂妥後，我乘戴先生座車去勝利大廈接于樞機到曾家岩戴公館晚餐。客人只有于樞機一人，由我作陪。賓主相見甚歡，暢談竟夕。進餐時備有精緻小菜，酒用白蘭地。于樞機說用小杯，每人只限三杯，結果一再逾限，終席時已盡一瓶。于樞機說：「教宗對我國抗戰，表示支持，近與我國交換使節即一證明，謝壽康先生將

出任首任駐教廷公使。我國抗戰勝利是遲早間事。勝利後有三大問題值得重視：軍隊編遣、經濟復甦、消除共產黨。」戴先生說：「只要政局穩定，軍隊及經濟問題不難解決，心腹大患乃是共產黨。共產黨以抗戰爲名，擴充實力竊據地盤爲實，今後對付共產黨較對日抗戰更爲艱苦。希望全世界天主教教友予我支援，國內教友積極參加反共聖戰。」曾家岩一夕話，更堅定了于樞機爲反共而奮鬥的信念，嗣後都見諸行動。飯後已近午夜，我仍乘原車送于樞機返勝利大廈。戴先生囑我與于樞機保持密切聯繫。一九四六年，戴先生遇空難殉國，于樞機極表哀悼，他對我說：「蔣委員長失去一條膀臂，真國家之不幸！」

一九四八年我在南京，在寓所邀于樞機便餐，並爲他介紹鄭介民及唐乃建兩先生。于樞機問我信不信教，我說我從小學到大學，都是讀基督教會學校，聖經也讀過，以對教義認識不深，懷疑之處很多，所以未信教。他說：「信教是心靈的奧妙，屬於神學範圍，不能用邏輯來推理，也不能在宇宙間有形的事物中求證。」從那天開始，于樞機借給我十幾本有關天主教教義的書，其中

以美國希恩主教(Bishop Fulton John Sheen)所著的幾本書如「什麼是天堂」、「心靈的恬靜」等最為精彩。希恩主教闡揚天主教教義，著作等身，馳名世界。他不像一般神父只背教條，他立論謹嚴，筆調輕鬆，用極近人情的例證，深入淺出，使人茅塞頓開。小女雪圖一向就讀天主教學校，幼年受洗，我夫婦受女兒的影響，對天主教早有偏愛。及受于樞機的精神感召，又讀希恩主教的大著，如黑夜中忽見久閉之門大開，看出去天空彩雲錦霞，地上萬紫千紅，如蓬萊仙境，頓覺短暫之生命成爲永恆，於是我夫婦決心領洗。一九五一年復活節，郭若石總主教在華山天主堂爲我夫婦主持受洗大禮彌撒，于樞機時在紐約，專函致賀。

一九五五年，雪圖在美國羅徹斯特女子大學畢業，除在醫院工作外，兼爲于樞機及陳之祿神父做臨時書記及打字員。經于樞機之介紹，雪圖與正在哥倫比亞大學進修之余傳鵬相識。不久傳鵬即專函我夫婦，向雪圖求婚。我們電詢于樞機，問余傳鵬之爲人。于樞機回電說：「Paul Yu is a good boy。」我夫婦當即電傳鵬、雪圖，同意婚事。婚禮在紐約舉行，于樞機爲主持婚配彌撒。前此雪圖一度要做修女，亡妻向于樞機哭訴。于樞機說雪圖是獨女，不可以出家做修女，他立刻函修女院院長制止。于樞機本身也是獨子，照說也不該出家做修士。但于樞機說一切都聽天主的安排，他的情形特殊，故例外獲准。

一九五六年，于樞機在臺北，一天他忽然要我寫一份履歷，我問他作什麼用，他笑而不言。

我一再追問，他說他曾見總統蔣公時，曾向總統進言，天主教教友中有不少外交人才，未蒙政府重用。總統要他開具名單履歷交葉公超部長量才錄用。我說不行，葉部長邀我回外交部，鄭介民先生(時任國家安全局局長)內定我前往西貢，負責與越南情報合作事宜，我已婉謝葉部長。于樞機說：「你應該出使外國，既決定前往西貢，也是爲國家做事，外交部事只好作罷。可是我怎麼向總統交代？」他是否開具名單推薦別人，不得而知。我去西貢前，于樞機寫了兩封介紹信，一致吳廷琰總統，一致吳廷淑主教，同時委託我協助雷震遠神父推動自由太平洋分會業務。我在西貢時，于樞機一度訪問越南，吳總統隆重招待，住專爲招待國家元首級的別墅，在總統府進餐，促膝密談，歷時五天。我在西貢工作順利，獲吳總統之信任，實于樞機之所賜。于樞機在幕後及側面支援我駐外人員，貢獻極大。聯合國控蘇案蔣廷黻先生在前線作戰，于樞機奔走遊說中南美二十幾國，使我票源增加，尤值得大書特書。

一九六七年，我奉派駐加彭大使，于樞機在自由之家爲我餞行，並寫一介紹信給加彭自由市主教。我到任後持函拜會黑人主教，蒙其盛筵招待，並爲舉行大禮彌撒，爲中華民國祈福。一九七四年，加彭與中共建交，我下旗回國，繞道紐約，因亡妻患血癌住院，需由我及小女輪流照顧。雖經醫師盡心治療，藥石罔效，一病不起。于樞機聞訊，欲親臨吊唁。他正感心臟不適，步履艱難，我堅持擋駕。後由毛振翔神父主持飾終彌撒。事後于樞機問我有無悼亡詩文，我說還來不及

作詩，只有輓聯一付。他說寫出來看看。原文如下：

卅七年柴米夫妻，遽同奉倩神傷。雖云永福人天，有文章向碧落招魂，但願珮環常入夢。

十萬里飄零身世，更比安仁命薄。無奈齊觀生死，想造物爲人才惜福，故留因果證來生。

于樞機說文字雖好，大有道家佛家意味，不像出自天主教教友的手筆。我當即改作如下：

卅七年柴米夫妻，羨卿玫瑰經熟，早進天堂侍聖母。

十萬里飄零身世，愧我葡萄園晚，獨留塵俗戰撒旦。(且字讀平聲)

于樞機說：「這才像天主教教友的口氣。」當將原稿收存。

于樞機晚年患心臟病，他食量很大，心臟負擔加重，外出需人扶持或坐輪椅。仍打起精神，與人談話滔滔不絕，又以工作繁忙，缺少休息靜養時間，以致病情加劇。一九七八年五月，魏道明(伯聰)先生在臺北逝世，公祭之日，我在靈堂遇于樞機，憂容滿面，舉步蹣跚。他說：「魏先生與我同年，想不到竟先我而去。」言下不勝唏噓。同年八月，教宗保祿六世逝世，于樞機取道美國，前往羅馬奔喪，奔波勞碌，心臟病突發，追隨教宗同昇天國。于樞機學通天人，皈依大教，復效法孔孟，祭天敬祖，亦不排除其他宗教，瑰意琦行，不同凡俗。有人批評他易受人包圍

蒙蔽，用人多欠斟酌，殊不知于樞機胸襟開朗，胞與爲懷，常希望壞人變好。「君子可欺以其方」，壞人一時得逞，固無傷盛德。綜觀于樞機一生爲國家、爲教會、爲朋友、爲後生，都盡忠竭智，仁至義盡，稱爲一代哲人，當之無愧。

貝祖貽理財能手

父執蔣履福（範五）先生於一九三〇年出任駐義大利大使館，當時外交部王正廷（儒堂）部長派遣駐外使節，代辦多於公使，人稱「代辦外交」，也算一時風尚。蔣代辦赴任過巴黎時，將幼女愛玲（原名士雲）付託我夫婦監護，就學天主教修女主持之女子中學。校規甚嚴，每逢週末假日，愛玲出校返校，必須由我夫婦中一人接送，出校時即住我家。因係世交，愛玲長兄有略（海如）又爲我幼年家塾同窗好友，故相處如一家人。一次愛玲往倫敦度假，巧遇上海中國銀行經理貝祖貽（松蓀）兄，愛玲妙年妍麗，松蓀兄爲之傾倒。愛玲返巴黎後，松蓀兄追蹤而至，週末必到我家，偕愛玲出遊，有時亦邀我夫婦作陪。松蓀兄與愛玲爲蘇州同鄉，吳儂軟語，情投意合。松蓀兄爲吳縣商業世家，廿三歲即在北京中國銀行服務，由基層做起，辦事精明強幹，對人笑口常開。兩年後調職廣州分行，因得學會廣東話，與革命政府財經要員如宋子文等結交。一九二七年，升任上海分行經理，一九三一年以考察歐美銀行到了巴黎。他正值斷絃待續，很快就向愛玲求婚。愛玲極感突然，內心志志難決。問題是愛玲才滿十八歲，而松蓀兄年近四十，年齡極不相

配。愛玲大姐懿珍，姐夫唐在均（孟平）時任駐漢堡領事，聞訊趕到巴黎，與我夫婦等開一小型家族會議，對愛玲婚事意見紛歧，乃決定請蔣代辦前來巴黎，俾作最後決定。結果末末翁婿相見恨晚，婚事急轉直下，在公使館舉行婚禮，我夫婦成爲當然「大媒」。

新婚夫婦回國後在上海定居。松蓀兄原配所生子女各三，幼子聿銘爲美國名建築師，工於設計，名利雙收。松蓀兄爲理財能手，尤精銀行滙兌業務，他在外國銀行壟斷情勢下，爭取滙兌業務，賺取外滙，使中國銀行在海外設分行多處。一九三四年，他推動幣制改革，穩定法幣，抗戰期間，與英商滙豐銀行合作，維持法幣滙率。一九三九年，中英合組穩定貨幣管理委員會，松蓀兄爲華方委員之一。一九四一年，升任中國銀行總經理（一九四六年，改任中央銀行總裁）。一九四九年，任技術代表團代表，赴美爭取美援。退休後一度任美亞保險公司董事長。一九六二至一九七三年，任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董事長。晚年僑居紐約，逝世時年八十九歲。

我在駐外使領館服務時期，每次回國，在上海必住福開森路貝家。一九三七年揭開抗戰序幕，一天在將進餐時，忽來一不速之客，身材不高，雙目炯炯有神，熱情洋溢，經介紹才知道是戴笠（雨農）先生。主人邀他入座後，大家閒話家常。松蓀兄介紹我時說：「天邁兄已奉准駐巴黎總領事，日內啓程赴任。他就是我常提到的『大媒』。」飯後在客廳談到抗戰，戴先生說他正在主持組織「蘇浙行動委員會」，松蓀兄、杜月笙

、錢新之、俞鴻鈞、吳鐵城、劉志陸、蔡勁軍、吉章簡等都是委員，另由學生、工人及愛國青年成立別動隊，武裝抗敵。談到國際關係時，戴先生說外交是另一重要戰場，勉勵我做一外交鬥士。戴先生常到貝家，因得機會長談，最後他介紹我加入復興社，我動身在即，時間迫促，他說將電告駐德副武官唐縱（乃建），要我到任後與唐先生聯絡，完成入社手續。無松蓀兄我不會結識戴先生，無戴先生我也不會結識鄧介民先生，日後成爲他們兩位的幹部。貝家幾次長談，影響我中年的政治生涯，對我個人說，是劃時代的一次遇合，值得紀念。

戴先生及松蓀兄與宋子文先生關係密切，抗戰期間，戴先生遇有財經大計，必就商於宋貝兩位，在幕後支援者尚有杜月笙先生。松蓀兄從中協調配合，戴先生不便出面時，松蓀兄則負起溝通責任，圓滿達成任務。松蓀兄內外圓和，諷可親，嫻於辭令，每於戴先生緊張激動時，松蓀兄以輕鬆語調和，戴先生心情頓歸寧靜。松蓀兄經常到曾家岩及楊家山與戴先生餐敘，往還頻數。抗戰後期，我由印度飛越駝峰返回重慶，戴先生即日送一軍統局聘書，聘我爲設計委員，隨後又發表我爲機要室秘書，四個月後調我爲海外區區長，寵信逾恆，同仁認爲異數。此固因松蓀兄在戴先生面前對我的評價過高，徐業道、劉啓瑞、龔仙舫諸兄的吹噓也有其影響力。

自重慶至南京而臺北，松蓀兄獨來獨往，隨政府遷都，播遷，從未離崗位，愛玲僑居紐約，偶一回國，等於度假，爲時甚暫。一九七三年後

，松蓀兄完全退休，在紐約寓所頤養天年，精神雖好，體力漸衰，走路賴手杖維持平衡。我於一九七四及一九八一年兩度赴美，得與松蓀兄夫婦重聚。一九八一年除夕，愛玲在大姐懿珍的獨子唐漢堡家請我吃年夜飯，松蓀兄已不復行動，臥床靜養。一次我在臥室與松蓀兄閒談，出來時愛玲問我：「他知道你是誰嗎？」可見當時已有昏瞶現象，記憶力衰退。松蓀兄逝世時，我已回臺北，聞訃無任怛傷。

林頂立肝膽照人

我在大陸時結交的本省籍朋友先後有黃朝琴、游彌堅、劉啓光、林頂立，前二人是外交界同事，後二人與我有軍委會工作關係，頂立與我接觸較多，印象亦最深刻。頂立祖籍福建詔安，出生於臺灣雲林縣，早年回國就學廈門，後留日入

編輯部啓事

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，日有十數起，惟有許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，本誌以名人傳記，真實傳奇，軼聞趣談為主，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雋趣；來稿以六千字為限。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。）來稿若未採用，恕不奉覆，亦不退稿（務請自留影印底稿）。

明治大學，九一八事變後回國參加抗日活動。抗戰期間，頂立受戴（雨農）先生感召，在閩粵中南島等地作敵後工作，蒐集情報，忠勇精勤。一九四三年，頂立到重慶，我適負責軍統局海外工作，第一次與頂立會晤在棗子嵐嵐「激廬」，我見他熱情坦率，肝膽照人，結為知交。我告訴他盟軍勝利在即，我國戰勝日本，必收復臺灣，囑他早作準備。勝利後軍統局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，頂立首任臺灣工作站站長，兼警備總司令部別動隊司令及政治研究室主任。二二八事變，頂立號召臺胞擁護政府，奔走調停。他創辦「全民日報」，呼籲全民團結，建設臺灣為復興基地。後因人事磨擦，保密局臺灣站站長改派郭壽華繼任。

一九四八年，我來到臺灣，毛人鳳局長委我以督導臺灣工作任務。我發現郭壽華與本省人士多有隔閡，不適宜作臺灣站工作。我向毛局長建議，仍以頂立接任站長。我寫信兩封，一為推薦頂立，一為營救因案被押之馬漢三，交頂立親飛南京面呈毛局長。結果頂立接任站長事獲准，漢三案則毛局長以「領袖英明，勿枉勿縱」冠冕堂皇的遁辭，搪塞了事。

一九五一年，吳國楨繼陳辭公出任臺灣省政府主席，標榜民主政治，浮誇味督，不切實際，頂立看不慣吳的新官僚作風，在全民日報展開強烈攻擊。吳國楨讀鄭介民先生為之緩頰，鄭先生囑我轉告頂立，不要做得過火，以免損害政府形象。我告頂立後，全民日報即日停止攻擊。事後吳國楨向鄭先生致謝，並表示將借重我及頂立在

省府任職，鄭先生當即婉拒。我與頂立各收到省府顧問聘書一紙，頂立主張原件退回，我說不必，置之不理可也。

同年，全民日報、民族報、經濟時報合併為聯合版，後二年又改為聯合報，頂立任發行人。省臨時議會成立，頂立當選為副議長，氣勢凌駕議長黃朝琴，致使二人失和，我為之排解，並勸頂立稍敘鋒芒。頂立廣交遊，多門客幫閒，難免龍蛇混雜，後來出任農林公司董事長時，竟以觸犯違反糧食管理條例被判徒刑七年。頂立重義氣，乃因部屬不肖，代人受過，內情非外人所能盡悉。我曾往探監，見其健康不佳，囑其保重。服刑三年後以高血壓保釋出獄。

頂立崇拜關公，家有神龕，供關公神像，早晚出入必膜拜默禱。頂立抱英雄主義，跌宕不羈，對酒色亦未能免俗，一次偕其夫人前往「萬里紅」酒家「相親」，共同選中一妙齡酒女，接其回家，納為小星，羨煞不少懼內朋友。

頂立出獄後經營國泰關係企業，並在家鄉開設頂芳及頂興兩公司，外銷塑膠產品，有時亦來臺北，仍寓泉州街舊居。

一次我去泉州街看他，在門口有一五歲女孩，我問她公公不在家，頂立聞聲出視，他說：「那裏來的公公，我是她父親。」當時頂立已七十三歲，那年冬天以心臟病逝世。

據頂立生前告我，他被判徒刑前，關公曾在他夢中示警，出獄前亦在夢中見關公面露笑容，不知頂立謝世前亦有朕兆否？

（未完待續）